



# 对违法行为吹哨应“宽进严筛”

## 法治观察



受理机关应当兼具敏感性和定力,既不轻率放过任何线索,也不应过度反应而启动不必要的调查

■ 缪因知

最近,中国证监会会同财政部发布了《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吹哨人”奖励工作规定》(以下简称《吹哨规定》)。《吹哨规定》是对此前《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的替代与升级,也为其他领域的吹哨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所谓“吹哨人”,源于英文中的“whistleblower”,指那些了解违法行为情况,掌握关键线索及证据,主动向有关部门提供违法行为线索的单位或者个

人,“吹哨”一词近年来也出现在安全生产、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领域的行政规章中,我们可以将其广义理解为举报,其在现代监管体系中具有独特价值。

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例如通过财务造假进行不实信息披露,或基于违法动机实施内幕交易等,这类行为通常不易被包括执法者在内的外部人员所察觉。因此,吹哨在提供办案线索、及时发现和遏制违法行为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前证监会披露的举报案例数量较少,也凸显了通过制度化奖励激励“吹哨人”的必要性。这一举措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相契合。

然而,实践中,错误举报乃至恶意诬告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源于对事实或法律条文的误解或无知,有的则是为了发泄情绪而恶意诬陷他人,还有些则是为了打击有害往来的前雇主、竞争对手。因此,如何在有效激励“吹哨人”的同时,准确筛选出有价值的线索,成为制度设计的关键。《吹哨规定》在这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安排。

一是强化对“吹哨人”的保护并为其吹哨提供便利。例如,要求严格保密“吹哨人”信息,提倡但不强制实名提供线索,允许通过证监会网络平台、邮

寄等渠道非当面提供线索。在审核及发放奖金时,也尽可能少收集“吹哨人”的信息,以降低其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二是强调对举报线索的核实要求。“吹哨人”应当提供涉嫌违法主体的信息,提供可供核查的具体事实和客观证据,确保线索具备可以进行初步调查的价值。

笔者认为,健全的吹哨机制应当秉持“宽进入、严筛选”的原则。一方面,“吹哨人”不管是对事实的掌握,还是对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可能未必全面、专业,我们不能期望“吹哨人”像办案机关那样把工作做扎实了才出手调查,比如内部知情人察觉到本公司“气氛异常”或存在不合理迹象,即使掌握信息不完整,也可成为一次合理的吹哨。

另一方面,受理机关应当兼具敏感性和定力,既不轻率放过任何线索,也不应过度反应而启动不必要的调查。受理机关应视举报人的身份、材料内容详实程度、证据支撑度、表达清晰度等进行综合判断。比如,企业内部高级管理人员的实名举报比同样材料的匿名举报更值得重视,在征得“吹哨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深入问询或核查。同时,处理流程应及时通过受理平台向“吹哨人”反馈,从而在制度运行中实现既不忽视线索,也不盲

目立案调查的平衡。

对于“吹哨人”提供信息存在不实之处的情形,也应区别对待。根据《吹哨规定》,对刻意捏造材料、恶意诬告举报的“吹哨人”,可以追究其责任,而对于因认知局限、合理推测或事实误判而产生的举报,则由受理机关在筛选阶段自行处理即可。

此次最受社会关注的,莫过于“吹哨人”的奖励机制。根据《吹哨规定》,对严重破坏证券期货市场秩序、严重危害金融安全,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案件吹哨可被纳入奖励范围;可奖励案件的罚没款金额门槛从此前的10万元提升至100万元,奖励标准由案件罚没款金额的1%提升至3%。同时,明确冒用身份、线索已公开或已查处,“吹哨人”为案件主要责任人等情形不予奖励,清晰划定了制度边界。这一调整既提升了激励力度,又通过明确排除条款防止制度被滥用,体现了激励与规范并重的思路。

总体而言,《吹哨规定》的内容较为完备合理,在激励与约束、保护与核实之间取得了较好平衡。期待这一机制在未来实践中不断完善,成为强化资本市场治理的重要利器。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 社情观察

□ 常鸿儒

据媒体近日报道,目前在网络平台上,有商家自称拥有可屏蔽“限高”信息的信息系统,只要提供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护照等信息,便能帮助“限高人员”购票,甚至还有专人制作了为“限高人员”正常出行提供便利的攻略,此事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限高”顾名思义就是“限制高消费”,高消费行为包括乘坐飞机,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入住星级酒店等。在法律上,对于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法院通常会发出“限制消费令”,简称“限高令”或“限消令”。这是一种强制执行措施,旨在约束其高消费行为,防止恶意逃债,督促其履行义务,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

然而现实中,部分“限高人员”在被采取“限高”措施后,不是想着如何配合执行工作以解除“限高令”,而是琢磨如何绕开“限高令”逃避法律责任。例如,此前有媒体报道,有人利用新旧版护照交替产生的信息“时间差”实现订票,以躲避监管,但目前这种方法已不可行。从近期报道来看,号称能够帮助“限高人员”订票的中介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购买机票,一种是利用境外的购票软件进行购票,为一种则是利用积分来兑换机票。

深入剖析不难发现,中介之所以能通过这两种方式钻空子,关键在于信息不互通、监管有盲区、责任未压实。一方面,境外平台未接入我国“限高”信息库,无法识别购票人是否属于“限高人员”,而国内监管部门又难以对境外平台的售票行为进行管控,从而形成监管“真空地带”。另一方面,部分航空公司对积分管理不严,在积分兑换环节仅校验积分持有人信息,未严格核查乘机人是否属于“限高人员”,也未与法院“限高”名单进行比对,导致中介仅凭积分就能为“限高人员”兑换机票。应当看到,此类行为不仅会令“限高令”形同虚设,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更会侵蚀司法权威、破坏社会信用体系,必须及时堵上这些漏洞。

针对境外购票软件的漏洞,关键在于打通数据壁垒,实现跨主体、跨领域信息联动。应尽快推动法院“限高”名单与公安出入境系统、民航系统实现实时数据共享,并推动与境内有合作代理关系的境外票务平台完成信息对接,将护照信息与“限高人员”进行绑定,确保无论“限高人员”是使用身份证还是护照、通过境内还是境外平台购票,都能被精准识别并拦截。

堵住积分兑换漏洞,需要进一步规范航司积分管理,压实航司主体责任。航司需全面优化积分兑换规则,严格核验非本人积分兑换机票的行为,将乘机人身份与法院“限高”名单实时比对,明确限制“限高人员”的积分兑换权限。同时,加强积分来源核查,建立积分兑换全流程台账,记录积分来源、兑换人、乘机人、航班信息,及时冻结、清理为“限高人员”兑换机票的积分账户,让中介的“小动作”无所遁形。

除此之外,还需进一步强化监管,斩断灰色产业链。网络平台要履行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清理“限高代订”“突破限高”等违规广告,对相关中介账号予以限流、封禁,从源头上遏制违规信息传播;执法部门应加大对相关中介的打击力度,对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禁令的权威在于落地。堵住违规购票漏洞,既是对失信行为的有力惩戒,也是对诚信社会的坚定守护。境外购票软件、积分兑换等漏洞,看似是技术层面的疏漏,实则是治理层面的短板。唯有以数据互通打破监管壁垒,以责任压实堵住管理漏洞,以技术赋能提升防控效能,以严厉惩处形成强大震慑,才能让“失信者寸步难行”成为社会共识,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 儿童智能表要回归安全本位

□ 黄宗跃

“碰一碰”加好友、主页刷剧赏、虚拟宠物养成……如今,一些儿童智能手表日益呈现出“手机化”倾向。这款初衷在于守护安全的工具,正逐渐异化为功能繁复的“迷你手机”,不仅引发沉迷、攀比等问题,更滋生灰色产业链与信息安全风险。当小小表盘成为儿童的“虚拟社交战场”,如何划定边界、净化生态,使其回归安全本位,已成为一道亟待破解的成长考题。

儿童手表的“手机化”偏离,实则是产品功能扩张与儿童成长规律之间的错配。在行为层面,过载的社交娱乐功能不断侵蚀孩子的专注力与时间管理能力;在价值观层面,以点赞数、虚拟徽章为核心的社交机制,无形中将儿童自我价值过早捆绑于虚拟符号,助长攀比之风,削弱现实社交意愿;在安全层面,功能漏洞更衍生多重隐患,直接威胁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乱象背后,是企业的逐利短视、行业标准的长期缺位与儿童社交需求的被异化利用。部分厂商为争夺市场,背离“安全为本”初衷,盲目堆砌社交、娱乐、消费等功能,将儿童市场简单视为流量洼地,漠视社会责任与法律红线。与此同时,行业长期缺乏强制性国家标准,在信息安全、功能边界、防沉迷等方面存在规范空白,致使乱象丛生。从心理层面看,儿童天然的社交需求被电子产品导向虚拟依赖,尤其在现实陪伴不足的情况下,更易陷入“数字沉迷”。

不久前,《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标发布,为行业治理提供了关键支点。该标准从物理安全、信息安全、防沉迷等维度划定红线,明确禁止预置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应用程序,强化家长管控权限,要求建立适配儿童的专属内容池,为产品“减负”。生态净化确立了依据,标准的生命在于执行。监管部门须以此为契机,推动全链条动态监管:严格前端产品合规审查,敦促企业剔除诱导性设计;严厉打击后端刷赞卖号、破解监控等灰产,切断利益链,形成有效震慑。

让儿童智能手表回归安全本位,尤需监管、企业、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各界形成协同治理合力。生产企业应摒弃“功能竞赛”逻辑,坚守“儿童友好”准则,聚焦定位、紧急呼叫等核心安全功能,切实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体责任。家校则须共同丰富孩子的现实成长环境:家长既要善用管理工具,更须以陪伴与多样化的线下活动,帮助孩子建立真实的社交纽带与成就感;学校宜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培育儿童理性的社交观念与信息辨别力。当现实世界足够充盈、温暖,虚拟符号自会失去其过度吸引力。

科技产品的价值,不在于功能的繁复,而在于其是否真正护航成长。在数字化浪潮中,我们无需担忧技术融入童年,但必须恪守“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一根本原则。唯有以严格标准规范发展,以责任伦理引导企业行为,以温暖陪伴夯实成长根基,才能让儿童手表摆脱“手机化”倾向,使其真正成为孩子们安全健康的可靠伙伴。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 明晰权责让研学游规范发展

## 筑牢民航安全发展法治基石

## 法律人语

□ 赖伟能

近年来,伴随民航业的高速发展与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民航安全正面临日益复杂的挑战。从扰乱客舱秩序的“机闹”现象,到无人机“黑飞”等新型安全隐患,公众对飞行安全的期待不断提升,也对行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前不久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立足民航业快速发展与安全挑战并存的现实,突出强化了民用航空活动安全保障体系,系统回应了当前民航安全有序运行所面临的各类风险与挑战。

以公众高度关注的“机闹”行为治理为例,近年来,擅自开启航空器应急舱门、在机舱内寻衅滋事、散布民航安全谣言等“机闹”事件时有发生,不仅严重干扰航空运输秩序,更直接威胁飞行安全,部分极端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这类问题的产生,既源于个别旅客安全意识淡薄,也暴露出原有法律制度在约束和惩戒方面的不足。针对这一治理痛点,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构建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制度体系,精准破解实践中的难题:

其一,在授予机长处置权时,明确了处置措施类型和裁量空间,破解了“不敢管”难题。规定机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权采取“包括必要的管束措施在内的合理措施”,相较于此前有权采取“必要的适当措施”的表述,新法对机长的权力授予更加具体。当航空器处于飞行过程中时,机长具有最高指挥权,必须肩负起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法律责任。考虑到飞行中的航空器空间封闭、信息受限、反应时间紧迫的特殊性,面对扰乱行为机长必须及时处置,这里的“合理措施”应以当时情境下的合理判断为标准,而非苛求事后看来完全无误,这有助于减轻机长的履职顾虑。同时,明确机长“必要时可以请求或授权旅客提供协助”,这为快速控制扰乱行为提供了支持,有助于强化现场处置合力。

其二,对妨害民用航空运输安全和秩序的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破解“不会管”难题。以往对“机闹”行为的界定和处罚多依赖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对不构成犯罪的相关行为处罚力度有限。新法采取“列举+兜底”方式,明确了十一种禁止性行为,涵盖擅自开启应急舱门、破坏设施设备,违规进入驾驶舱,在驾驶舱吸烟、妨碍机组人员履行职责,强占座位、堵塞安检通道等行为。此外,还以“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进行兜底,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这一系列规定为机长及机组人员依法处置提供了明确依据。同时,新修订的治安管理规定也增设了“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处罚条款,有助于形成惩戒合力,更有力地震慑和惩处违法人员。

其三,对其他人员的航空安保职责作出明确规定,破解“不能管”难题。新法增设“民用航空安全保卫”专章,系统划分各方主体责任。在航空器内,明确机长和机组成员均须履行安全保卫职责,维护民用航空器内秩序,这为机组人员协同履职,共同处置扰乱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机场区域,明确民用机场运营人应当按照民航主管部门规定,落实安全保障措施,为强化落地执行,交通运输部修订了《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与新法同步施行,这有助于进一步压实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

安全是民航发展的基石和前提,应当看到,针对“机闹”现象完善法律治理只是此次民用航空法修订中构建安全保障制度体系的一个侧面。作为我国民用航空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修订后的民用航空法不仅在总则中鲜明确立“坚持安全第一、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基本原则,更将安全理念全面融入各章节,系统织密安全保障制度网络。在具体制度上,新法从完善航空器的设计、生产等适航管理制度,到系统化强化空域安全与飞行安全,再到增设安全保卫专章,全面推动民航安全治理从“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模式升级。此外,随着低空经济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面对无人机“黑飞”扰航等新型风险,新法也保留了应对的制度空间。在新法正式施行前,还需进一步推进配套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与民用航空法的衔接工作,从而筑牢民航安全发展法治基石,切实守护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

## 热点聚焦

□ 孔德淇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2026年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其中首次新增《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以合同范本明晰研学游交易各方权责,为行业健康发展明确参照标准,让研学旅游服务的开展更加规范。

近年来,研学游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成为青少年增长见识、锤炼品格的重要途径。但火热的市场背后,配套规则滞后,各类乱象频发等问题不容忽视。此前,辽宁一学生在研学活动中受伤,却因权责不清陷入维权困境;浙江有家长为孩子报名的研学项目,实际上是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打卡;一些打着“名校深度研学”旗号的项目报价混乱,额外付费的讲解服务竟由缺乏资质的兼职人员仓促承担……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研学内容无明确约定,服务质量无量化指标,安全责任无清晰划分,让“研学”名不副实,既损害了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也制约了行业的长远发展。

此次新增的《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直击行业痛点。文本明确要求列明研学线路、行程安排、课程内容和时长、服务费用构成等核心要素,将“研什么、怎么研、谁来教”这些关键问题白纸黑字写入合同,让模糊的研学服务变得清晰可考。

安全是研学游的底线,更是青少年参与活动的根本保障。文本强化安全保障要求,明确旅行社需选用合格供应商,履行安全告知义务,突发事件需及时救助处置。同时,拓宽维权渠道,强调游客者在境内研学时,可向组团社、地接社或履行辅助人主张权利,还列明食宿条件、退费规则等,既让家长签约时心中有数,也为旅行社经营划定清晰红线。合同示范文本的价值,在于落地执行,形成共识。研学游市场的规范发展,需要各方以合同示范文本为参照,同向发力,协同推进。旅行社应对标示示范文本,规范合同签订与履行,杜绝虚假宣传,擅自变更行程等违规行为;监管部门要将合同签订履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严惩使用不公平格式条款、无资质经营等行为,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家长需增强维权意识,仔细核对合同条款,不轻信口头承诺,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此外,针对研学旅游指导师资质混乱、培训乱象等行业顽疾,还需加快完善职业标准,健全资质评定机制,通过专业化建设提升行业服务水平,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提出“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构想,到文旅部出台多项行业标准规范市场秩序,再到此次新增专项合同示范文本,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完善,既彰显了国家对研学游教育价值的高度重视,也为行业指明了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这份合同示范文本,并非束縛行业发展的条条框框,而是引导行业良性竞争的标尺,让合规经营的旅行社脱颖而出,让投机取巧的不良商家无所遁形,最终推动研学游回归教育本质,让孩子们寓教于游,让家长们安心放心。

研学游不该成为家长的烦心事,更不该沦为商家的“摇钱树”。研学游告别野蛮生长,步入规范发展的快车道,离不开制度持续健全完善、市场主体自觉践行和社会各方共同监督。唯有多方携手,久久为功,才能让每一次研学都“研”有所依,“学”得安心,让孩子们在行走的课堂中真正开阔视野,收获快乐。

## 图说世象

## 法治民生

□ 郝翔宇

眼下正值新年招聘季,无数求职者正在求职之路上奔波。不少人发现,一道名为“背景调查”的关卡,正悄然变成求职路上的新困扰。据媒体报道,不少背景调查存在侵犯隐私、流程形式化,结果受“个人恩怨”影响等问题,相关纠纷时有发生,亟须予以纠偏。

作为企业核实个人信息、防范用工风险的正常环节,背景调查的本意在于确认求职者信息的真实性、降低企业用人风险。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企业“先调查后补录”,调查完成后才想起获取求职者授权;有的调查范围不断越界,将求职者多年前的信用记录、家庭状况、社交媒体记录等与职业能力无关的内容均纳入审视范围;有的则将求职者前单位同事的单方面说辞、个人主观印象等信息作为关键结论写入报告……这类背景调查不仅会给求职者的职业声誉蒙上阴影,还可能无形中造成歧视,损害平等就业权。

乱象之下,甚至滋生了相关黑灰产业。网络上,不时有人声称能够提供“优化”履历、“处理”不良记录、“定制”背景调查报告的服务。这不仅扰乱市场秩序,更形成恶劣的“逆淘汰”,造假者可能因此顺利通关,诚实者反而吃亏。长远来看,伤害的是整个就业环境的诚信根基。



漫画/高岳

# 莫让背景调查变成“背景伤害”

应该看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已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但具体到职场背景调查这一场景,对于“什么能查、什么不能查”“哪些内容属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敏感信息应如何处理”等具体问题,目前仍缺乏统一细致的操作指引。这导致背景调查的边界模糊,执行中也容易“各自解读”,为用人单位随意扩大调查范围留下了空间。此外,部分用人单位在认知上也存在误区,有的盲目追求信息的全面性,误以为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能规避风险,却忽视了信息收集的合法边界与企业自身的合规责任。这种认知偏差,也是推动背景调查不断越界的内在动因之一。

正因如此,要纠正上述乱象,就需要多方协同、综合施策,方能给背景调查这道“安检程序”铺好轨道、装上护栏。

首要在于明确规则,树立清晰红线。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研究制定适用于用人单位背景调查的信息收集清单,清晰列明可采集的信息范围,明确划出“禁区”或“限制区”。特别是对高度敏感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设定严格的查询条件和程序。唯有让各方知晓调查的边界在哪里,才能推动背景调查活动依法开展。

监管亦须发力,提高违法成本。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强化协作,加强对背景调查服务行业的规范管理,建立必要的备案或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针对性抽查,重点核查信息收集的合法性、程序规范

性和数据安全性,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获取、买卖个人信息以及伪造证明、报告等黑色产业链,并将严重违法失信主体纳入联合惩戒范围,让逾越红线者付出应有代价。

救济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切实保障求职者合法权益。有关部门应进一步优化与背景调查纠纷相关的维权途径,缩短案件办理周期,提高维权效率,及时回应求职者诉求。同时,要加强法治宣传,普及背景调查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明确求职者享有的具体权利与规范化的维权流程,引导求职者增强依法维权意识。

观念更新与责任压实同样关键。用人单位和背景调查公司必须转变观念、压实责任。一方面,应时刻谨记背景调查必须合法合理,切忌过度收集信息;另一方面,可探索建立必要的求职者知情与异议机制,当用人单位基于背景调查中的不利评价作出录用决定时,应在保护相关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以适当方式告知求职者决定依据,并给予其解释说明的机会。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安全感;在就业市场,公平公正关乎社会的活力与信心。治理背调乱象,是法治建设的细微处,也是民生保障的落实处,这既需要规则完善、监管到位,也需要企业自律与行业规范。唯有凝聚合力筑牢防线,才能让背景调查真正回归保障用工安全与促进人才流动的初心,共同营造更加规范、透明、公平、健康的就业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 不容「限高人员」钻监管漏洞